

国际关系

援助外交

张清敏

[摘要] 援助外交是外交的特殊形式,是主权国家的政治行为。它包括通过外交渠道争取或实施援助,以及通过援助实施外交政策两个方面的内容。援助外交不仅受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影响,也受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和总体外交政策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的援助外交在保持其政治本质的基础上,在内容上以经济援助为主,在形式和援助渠道上以多边援助为主,在目标上人道主义援助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 外交学;援助外交;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6-0017-22

全球化时代的“外交工作日益成为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等领域的一项系统工程”,形成了“总体外交”的“特色”。^[1]实施外交政策的手段也多种多样,本文拟就援助外交的概念、主体、本质、方式、发展趋势等阐述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援助,外援与援助外交

援助就是支持或帮助,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比较普遍和普遍的行为和现象。上升到国家间,则指国家之间相互提供的支持或帮助,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冷战初期,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是军事战略援助,后来逐步被经济援助所取代。不管是军事援助,还是经济援助,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和东西方对抗的手段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

对外援助与援助外交是两个联系紧密,而内容有所不同的概念。早期对援助外交的研究,多指一些国家以金钱为手段谋求国家外交利益的做法,往往具有负面的含义,典型代表是赤裸裸的“金元外交”。^[3]冷战结束后,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取代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政治对抗,成为国家间相互竞争的主要内容。对外经济关系或对外经济政策在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上升,被称为经济外交。由于当前国际上的对外援助主要以经济援助为主,因此对外经济援助

往往是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被关注,经济援助外交常常被作为经济外交的一部分而受到重视。^[4]但援助外交绝不仅局限于经济援助,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它首先是出于政治的或军事战略目的的援助,其次才是经济援助,当然也包括文化或人道主义援助等。

外交被认为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和其它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5]根据这样的认识,作为外交的援助,可以界定为国家通过以上外交活动或渠道争取获得援助或实施对外援助,或通过对外援助推行对外政策的行为。无论什么形式的援助,作为外交它应该是主权国家的行为,是执行外交政策的手段或工具。

二、援助外交的主体

外交的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援助总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援助的接受国,另一方是援助的提供国。正是前者有需求,才导致后者提供援助,因此援助外交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援助需求的国家为了获得援助而开展的外交,如二战后期开始,当时的国民政府先是为了抗日,后来从国内战争的考虑不断派出要员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游说美国政府来提高对国民政府提

供的援助。^[6]又如二战结束后,美国在西欧的盟国不断展开外交活动要求美国对西欧提供和增加援助,以改变其面临的困难局面等,都属于典型的求援外交例子。当今国际社会南北差距拉大,贫富鸿沟加深,广大发展中穷国面临巨大的援助需求,也需要开展相关的外交活动来获得外援,这是援助外交的重要方面。

其次是援助提供国为了提供援助而展开的外交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或接受援助的国家在争取援助时所面临的往往是一种被动和无能为力的局面,因此援助外交研究的对象多是援助提供国家及其援助政策的制定、政策内容和落实情况等。此外,援助提供国和援助接受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总体上看它们是对应的,具有明显的不同,但当今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既是接受援助国家,同时又是援助的提供国,如中国目前既是国际机构和其他国家援助的对象,又是重要的援助提供国。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流之一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主权国家,还应该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有学者从这种视角出发提出,在国际上的许多对外援助都是经过多边国际组织进行的,仅仅在联合国机构下就有30多个这样组织和机构,而且这些国际组织都有自己清楚的目标和意图,它们根据自己的专业范围承担执行联合国发展系统相应部门的发展援助项目,这些“国际组织一般都按照本组织的宗旨和政策进行援助,不完全受制于对国际组织捐献或出资的个别国家”,因此官方发展援助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国际组织。^[7]

但本文认为,尽管国际组织在国际援助活动中的作用在加强,但这些组织本身并没有自己的资金,而是靠成员国,即主权国家的捐献来进行援助的。这些组织的宗旨、援助对象和原则都是由该组织的成员,也是主权国家来协商确立的。换句话说,这些国际组织实际上是主权国家开展援助外交的舞台。首先是主权国家为了在这些国际组织内确立有利于自己的援助原则开展广泛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这是援助外交的主要内容。其次,一旦某一成员国认为这些组织的对外援助违背自己认识和解读的该组织的援助原则和目标,就会采取措施减少或停止向该组织提供资金,从而使这个国际机构的对外援助无法正常进行。如1985年美国声称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中国的活动“支持或执行强制性堕胎或节育生育的计划”,从它应提供的基金中扣除相当于该基金援助中国计划数目的1000万美元,以后连年都以此为借口减少它应该向人口活

动基金提供的资金。^[8]

此外,一些基金会或者跨国公司,特别是一些民间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根据本组织的宗旨,在国际上也广泛开展慈善援助活动,而且对外援助的金额在不断上升。但这些援助,不管援助数额多少,只要不被纳入到国家对外政策的总体考虑当中,或者不纳入主权国家的外交轨道,就只能说是一般国际援助,而不能被称作是援助外交。

三、援助外交的本质

从援助外交的内容和目的上看,可以划分为军事战略援助、经济援助、文化援助、人道主义援助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下,援助的主题不同。如在东西对峙的冷战背景下,国际上的援助主要以军事战略援助为主,经济援助为辅,即使经济援助也往往具有战略上考虑。随着冷战的结束,军事援助明显下降,经济援助的比例增加。从援助的形式上看,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物资援助和技术援助,前者包括资金或物资的赠与,优惠贷款,后者则包括人力支持和技术援助等。在冷战爆发初期,赠予性援助占对外援助的多数,后来逐渐减少,当前的国际援助多为优惠贷款和人力与技术援助等。

作为推行对外政策手段的援助,是外交的特殊形式,是有一定目的的行为。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认为,无论什么形式的对外援助,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其本质都是政治性的,其主要目标都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他列举了六种对外援助的形式:人道主义援助、生存援助、军事援助、名望援助、贿赂、经济发展援助等。他认为人道主义援助和生存援助看上去是非政治性的,但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保持国际力量对比现状。结构现实主义大家华尔兹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对外援助政策就是霸权的工具,军事援助直接服务于加强两极世界的安全体系,而经济援助则是给这个安全体系争取盟友和朋友,与行贿没有差异。^[9]在冷战期间的援助外交主要是基于政治的、战略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其目的是为了服务东西方冷战的需要,但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其表现又有所不同。

二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以摆脱国内孤立主义的羁绊,采取物资租借的方式援助英国,是援助外交的一个典型。冷战开始后,美国从1947年到1952年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了遏止共产主义在东南欧的“扩张”,向希腊和土

耳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为了阻止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7年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两年内每年自由支配2亿美元,援助中东国家。作为冷战另一方的苏联为了与美国相抗衡,针对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抛出“莫洛托夫计划”增加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在越南战争结束后,苏联除了继续向越南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外,还向越南提供了26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勾销越南在抗美援朝期间的一切对苏联的债务。^[10]苏联对越南的这些援助使越南进一步倒向苏联,也使越南成为苏联在远东扩张的重要基地。

援助外交与一般意义上援助的不同,还在于援助外交不仅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也受到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总体外交政策的影响。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提供大量的援助,这种政策既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响,也是与中国反帝、反霸以及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总体对外政策相一致的。前者如中国对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后者则更多地体现在中国对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

从表现形式看,援助外交的目的有时是显性的,即在实施对外援助时就对援助外交的目的有清楚的表达,如美国对西欧以及希腊、土耳其的援助。也可能是隐性的,即援助的直接目的没有说明,或在说明的目标后面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如,由于历史的原因,战后日本在与亚洲国家的交往中,难以得到信任。随着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大的发展,日本开始将对外经济援助当作“日本外交的重要手段”。从经济上看,以日元贷款为主体的官方对外援助不仅促进了受援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给日本企业带来很多好处:改善了日本在其他国家的形象,促进了日本与受到日本援助国家的关系,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在帮助日本走上政治大国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调整对外援助战略,提出对官方发展援助由“官方主导”转变为“政治主导”,援助的对象由“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与日本战略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以实现“政府开发援助”与“外交”的一体化。对于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的目的,日本媒体做了比日本政府更明确的注解,那就是:确立世界大国地位,圆在联合国的“入常”梦,夺取在亚洲的领导权;牵制和对付中国的“威胁”。^[11]

援助外交不仅受到援助提供国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大的外交战略等方面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一个国家总体外交风格的影响,因而也具有本国外交的总

特色。如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对外提供大量援助的同时,不接受国外提供的任何援助,这与当时中国的总体外交政策,以及当时中国的观念是一致的。因为那时的中国在观念上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相对孤立的国际环境又使之在政策上过于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提供援助的同时也接受了大量的援助,这种援助政策与中国外交上请进来、走出去的总政策是紧密相联系的。^[12]

作为国家行为,援助外交也反映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先后顺序。如对于同样具有国际影响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由于中国和美国所处的经济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对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经济援助政策有明显的不同。对于1994年至1995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通过政府信贷、银行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等多种渠道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但美国对1997年到1998年发生在亚洲的、影响更大的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政策,先是隔岸观火,只是承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有限的作用,最后在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的股市动荡之后,才伸出了援助之手,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的援助,而且数量非常有限。相对于对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有限反应,处于亚洲的中国对于1997年到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反应则迅速得多。不仅在对外出口压力巨增的情况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本身就是对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的一种援助),而且对最早受到亚洲金融危机打击的泰国提供了10亿美元的援助,随着危机的蔓延又向印尼提供了10亿美元的援助。中美两国对两次金融危机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中美两国不同外交考虑和对外政策的优先顺序。尽管美国的利益遍布全球,但美国的利益则更多地集中在美洲,特别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后。中国的援助政策则表明中国的重要政治、经济利益和影响主要集中在亚洲。

作为实现外交政策工具的援助总是有条件的。如当今不少西方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总是提出一些诸如要受援国进行政治改革、推行民主化、改善人权等条件,借援助对受援国施加压力,影响受援国政治的发展。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称这样的援助为“良制论和条件论”。中国在对外进行援助时从不以援助为条件对受援国施加压力,或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但总体上中国的对外援助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对方应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具体表现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如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国家加大了援助力度,但接受援助的国家必须

尊重中国的主权,不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

作为外交政策一部分的援助总体上体现的是一种支持,而援助的反面则是制裁,甚至是封锁,因此一些学者把经济制裁外交作为经济援助外交的一部分。^[13]在实践上,援助外交总是和封锁或制裁外交相对应甚至是同时实行的。如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根据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实行援助的同时,拼凑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制裁。在远东,美国在操纵对中国的禁运的同时,从1950年到1979年对台湾当局提供了高达59.8亿美元的援助,其中42.2亿美元是军事援助,17.6亿美元是经济援助。^[14]从援助到封锁之间有一个过渡,体现的是从支持到不支持,乃至反对。如1999年巴基斯坦发生军人政变,推翻了巴民选政府,为了反对巴新政府,英国和欧盟的其他国家先后停止了对巴政府的援助。从制裁的取消到援助的提供,体现的是由不支持到支持,或从敌视到友好的转变。如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制裁就是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而逐步放松和取消的。

四、援助外交的多元化

如果说冷战期间的援助外交服务于东西方之间的对抗战略,那么冷战结束以后的援助外交在保持其政治本质的基础上,在形式、渠道、目标上都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首先,援助外交更加活跃,经济援助外交成为主要内容。冷战结束后,纯粹为了军事或战略目的的援助外交大大减少,随着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上升,经济援助外交成为援助外交的主要内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增加了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的规模,大国也不断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如在对外援助经历了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的减少后,美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了对外援助的执行机构,增加了对外援助的规模,这种增长势头在“9·11”事件后有了新的提高。差不多同时,中国政府也在1995年对外援政策进行了调整,改善了对外援助的形式,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和范围。近年来,中国不仅对朝鲜、越南提供了防治禽流感紧急援助,向罗马尼亚水灾、伊朗地震、几内亚比绍蝗灾和霍乱、厄瓜多尔登革热、乌拉圭飓风灾害提供了物资或现汇紧急援助,还向尼日尔、布隆迪、莱索托、吉布提、赞比亚、莫桑比克提供了紧急粮食援助。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根据在2000年中非论坛成立大会上的承

诺,中国在两年内免除了非洲31个国家欠华到期债务156笔,总金额约109亿元人民币。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再次承诺到2009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2006年增加1倍。^[15]据此,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已拟于2007年底前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33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的168笔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16]

援助外交的活跃还表现在援助不再仅仅是富国对穷国,大国对小国的援助,而成为国家之间体现友好,增进感情,加强友谊的一个重要渠道。援助成为具有特殊效果的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和加强两国关系的纽带。如中国在遭受水灾、非典等影响后,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家都向中方提供了不同形式的援助。在2005年8月美国南部地区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中国政府向美国提供了500万美元救灾援款,以及一批救灾急需物资。这种类型援助外交在国家之间越来越频繁,成为援助外交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多边援助外交活跃。东西对峙的结束,消除了东西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合作的障碍,为国际社会的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国际间在援助方面的合作不断得到加强,对外援助越来越多地通过多边的渠道实施。这一点首先表现在联合国在援助方面发挥作用的增强。如2000年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确立了消除贫穷和饥饿、取得普遍的教育、促进性别平等目标,推动国际社会在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和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此外,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还专门召开国际扶贫特别会议和发展筹资国际会议等,推动和落实对外援助。在重大的国际性灾难和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都通过国际多边机构提供大量的援助。如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墨西哥提供了178亿美元的援助;^[18]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动用特别提款权对韩国、泰国和印尼提供了300亿美元的援助。有研究显示,当今全球30%—40%的官方发展援助是由各种国际金融和其它发展组织提供的。^[17]

除了国际组织在国际援助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外,国际社会还针对特殊的议题召开专门的多边会议,协商、推动和实施对外援助,成为援助外交的新亮点。如,国际社会针对艾滋病防治,特别是援助最不发达国家防治艾滋病问题召开了多次专门会议。又如阿富汗的塔里班政权被推翻后,国际社会为了援助阿富汗新政府于2002年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援助阿富汗国际多边会议,由61个国家和22个国际组织的代表

参加,筹集到50亿美元的援阿资金。为支持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的伊拉克恢复秩序,国际社会也召开了多次多边国际合作会议,协商对伊援助。其中2003年10月在西班牙召开援助伊拉克多边国际会议,有包括中国在内的71个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和世界银行等20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加。在会议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向伊拉克提供34亿和5亿美元的援助,日本承诺在2004年向伊拉克提供15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欧盟承诺提供2亿欧元,英国和西班牙两个欧盟成员国则表示将分别再出资5亿美元和3亿美元帮助伊拉克重建。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的日益活跃,中国在增加双边对外援助的同时,也开始加强了通过多边渠道的对外援助规模。如在2002年的东盟与中日韩金边会议上,中国表示将减免包括老挝、柬埔寨、越南和缅甸在内的六个国家到期的欠华债务。同年中国还向非洲开发银行提供5000万美元的援助;2005年中国向亚洲开发银行捐赠2000万美元以建立一个中心以帮助印度支那地区国家。在援助阿富汗的东京国际会议上,中国承诺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和100万美元的援助,随后又在阿富汗总统访华时再次承诺向阿富汗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18]在援助伊拉克的马德里会议上,中国承诺为伊拉克提供25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19]

第三,人道主义援助增加。在相互依存不断加强的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环境和传染性疾病等也具有鲜明的全球色彩,国际救灾行动也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一国遭灾,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侵害,而且会对国际经济发展有所影响。因此国际救灾援助不仅有助于消弭受灾国的灾害影响和重建家园,而且使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间接受益,国际社会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不断加大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合作,增加对人道主义援助的规模。

人道主义援助的增加首先体现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联合国在1992年设立了人道主义事务部,以确保联合国系统对自然灾害、技术灾害以及重大人道主义危机迅速做出反应。随着人道主义需求的不断增加,1998年联合国在人道主义事务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负责落实联合国提供框架内的人道主义援助。为适应人道主义援助规模越来越大的需要,欧盟(欧共体)也在1992年成立人

道主义援助局(ECHO),随后加大了在国际上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有研究表明,欧盟的人道主义援助遍及全球约30个冲突地区和85个国家,约占全球人道主义援助的30%。^[20]

在人道主义援助上,中国政府近年来本着“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根据受灾国要求和国际社会的呼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遭受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及时提供了紧急救灾物资、派遣救援队和医疗队,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现汇资金援助,积极参与了国际间重大紧急救援行动。仅2005年一年,中国政府就向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赞比亚、莫桑比克、美国等20个国家提供了26笔人道主义援助,得到受援国和其他国际救援组织的高度评价。^[21]

第四,援助外交目的的多元化并没有改变其作为外交手段的政治本质。作为外交手段的援助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和体现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变化。如中国援助的重点仍然是被称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但是,近年来随着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中地位的上升,中国对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断增加。有资料显示中国对周边国家援助的数额已经超过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一半。^[22]美国对外援助也多是从小国对外战略角度考虑而进行的。如“9·11”事件后,美国加大了对反恐战争前线国家的支持力度,美国国务卿赖斯2006年宣布对美国的外援机构进行调整时表示,美国将继续其对外援助方面的承诺,并表示必须用“对外援助帮助阻止出现新的阿富汗……使美国和世界更加安全”。^[23]为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擅长推行经济援助外交的日本政府在2005年8月举行的日本与中美洲7国峰会上承诺,向这些中美洲国家提供8200万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和1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帮助它们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

台湾当局为了实现“台独”的图谋,把援助作为推动台独手段的行径,是当今日益活跃的援助外交中的不可忽视的现象。近年来,台湾当局为了分裂国家,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对外打着“经济援助”、“低息贷款”、“无偿援助”等对外援助的旗号,图谋“争取国际生存空间”。如为了维持与中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台湾当局向与之保持有外交关系的7国共同体提供3210万美元的援助。台湾当局这些被称为“金钱外交”、“银弹外交”或“经援外交”的极端,则是“贿赂外交”或“贪污外交”,即除了“经援”、“贷款”之外,还开出百万甚至千万美元巨额支票给“邦交国”高官,来实现

“台湾独立”的梦想。如为了提升与一些国家的实质关系,台湾当局甚至设立秘密账户,通过金钱收买关键人士以影响这些国家做出有利于台湾当局的决策。台湾当局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援助外交的特殊形式,更可说是对援助外交的扭曲和滥用。^[24]

援助外交是随着全球化发展而逐渐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外交领域拓宽的表现。援助外交和其它形式的外交一样,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和优势悄悄地改变着传统外交的概念,赋予当代外交新的内涵,更新人们对外交的理解,使外交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与时俱进。

[注释]

- [1] 唐家璇:《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J],《求是》2004年第23期。
- [2] See Duncan L. Clarke, Daniel B. O'Comer and Jason D. Ellis, *Send Guns and Money,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s, 1997); John D. Montgomery, *Foreign Ai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1986);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第14页; 张光:《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M],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 [3] Robert. N. Garder, *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in Current Perspec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Dollars, Diplomacy, and Dependency: Dilemmas of U. S. Economic Aid* (Boulder, Colo: L. Rienner Publishers, 1993); 吴心伯:《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M],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 [4] 周永生:《经济外交》[M],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年版, 第270页; 张学斌:《经济外交》[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370页; 张健:《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M],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 [5] 鲁毅等:《外交学概论》[M],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年版, 第5页。
- [6] 陈永祥:《宋子文与美援外交》[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

- [7] 周永生:《经济外交》, 第270页。
- [8]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 1979-1994》[M],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26页。
- [9] 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3-14页。
- [10] 周永生:《经济外交》, 第89页。
- [11] 王嶋生:《日本新“经援战略”和外交动向》[N], 《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2月13日。
- [12] 参见詹奕嘉:《唐山大地震后30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历程》[J], 《世界知识》2006年第14期。
- [13] 鲁毅等:《外交学概论》, 第158页。
- [14] 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 S. 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 and Assistance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 83.
- [15] 《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6年10月5日。
- [16] 《中国拟于2007年底前免除33个非洲国家债务》, 2007年1月29日, <http://news.people.com.cn/GB/71648/71653/5341770.html>.
- [17] 张学斌:《经济外交》, 第370页。
- [18] 袁铁成:《中国1.5亿重金援助阿富汗揭密》[N], 《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29日。
- [19] Michael A. Glosny, “Meeting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 in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 <http://www.ncuscr.org/Publications/Foreign%20Aid%20Report.pdf>, p. 4.
- [20] 王玉萍:《欧共同体人道主义援助》[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 [21] 《去年我向20国提供26笔人道主义援助》[N], 《人民日报》2006年1月6日。
- [22] Glosny, “Meeting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 in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 p. 12.
- [23] “New Direction for U. S. Foreign Assistance”, USAID Factsheet, available at www.usaid.gov.
- [24] 刘红:《台海观察:台湾“金钱外交”黑幕重重》, <http://tw.people.com.cn/GB/14811/14869/2946939.html>.

作者简介: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07-07-29

修改日期:2007-09-08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From “Squeeze” to “Engagement”—An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Adjustment of US DPRK Policy

by *Liu Aming*

The US DPRK policy is a blind spot in the whole of the US East Asia alliance network, for which it has been working on for decades. As a result of this weakness, US interests in this region have been threatened since the 1990s, resulting in DPRK is conducting of its first nuclear test in October, 2006. In order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the U. S. changed its policy from squeezing the DPRK's international living space to direct engagement with DPRK, leading to the formulation and step-by-step enforcement of “2. 13 Joint Document”, the first bilateral direct talks and the gradual progress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 S. and DPRK, bringing new hopes for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is article aims at analyzing the reasons, nature and future of the present adjustment of US DPRK policy,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resolution process of the DPRK nuclear issu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7 Iranian Nuclear Issue and Gulf Security

by *Zhao Weiming & Zhou Shixin*

There exists a structural security dilemma in the Persian Gulf involv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ayers. The current Iranian nuclear issue is a strategic conflict between Iran's independent effort to acquire nuclear technology and the lack of confidence on the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intention of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Iranian defiant diplomatic stance upon the nuclear issue is worsening its original disadvantageous diplomatic environment. At present,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may bring about a dramatic change in Gulf security. The way of resolution and the final solution of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will determine the orientation of Gulf security in the near future.

13 Behind Globalization: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the Practice of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Order

by *Zhang Guangsheng*

Behind the universalistic discourse of globalization there exist certain special historical facts, that is, the continuation, deepening and diffusion of the practice of modernity. With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the Cold War being removed, boundaries between the Three Worlds seem to be abolished. However, the much touted victory of liberalism over communism, rather than confirming the teleology of modernization, has brought to the surface the inherent conflicts of globalization which render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even more problematic. To review the discourses of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to the dominance of nation-states is the task of this artic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 Foreign Aid Diplomacy

by *Zhang Qingmin*

Foreign aid diplomacy, a political behavior of sovereign state, is a special form of diplomacy. It has two major forms: one is gaining foreign aid or providing foreign aid through diplomatic means, the other is implementing diplomatic goals through foreign aid. Foreign aid diplomacy is not only conditioned b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ext of the actors of this policy, but also influenced by the ideology, guiding principles, as well as general foreign policy of the relevant country. While maintaining its political nature, foreign aid diplomacy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anifests some new features, including economic aid being the major content of foreign aid, multilateral aid becoming the major means and channels, and humanitarian aid becoming increasingly evident.